

特載

陷阱重重的香港——一場沒有贏家的遊戲

詹 鵬

（本文作者 Chalmers Johnson 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亞洲研究教授）

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簡稱 NIC）一詞列入國際政治與經濟的詞彙。這是因東亞資本主義開發國家——亦即香港、新加坡、臺灣和南韓令人驚異的成就而產生的新名詞。這四個國家（或地區）的共同特點是：相對的政治安定，附帶的具有準權威式的政治（quasi-authoritarian politics）和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經濟成長、公平的所得分配及高水準的教育。在二十年之間，這四個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的每人平均所得在東亞的成就僅次於日本。一九八二年，各國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總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分別為：日本九、六八四美元，香港五、三九〇美元，新加坡五、二二〇美元，臺灣三、五八七美元，南韓一、七二〇美元，以及中共三〇〇美元①。

然而，到一九八四年中期香港有了嚴重紛擾。雖然「新興工業國家」一詞仍然適用，但是明顯地香港很快地將特別需要適用於它的一個新名詞。在「新興工業國家」一詞的範疇內，香港正處於我所提出的所謂「最近崩潰中工業國家」（Collapsing recent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簡稱 CRIC）的路程上。香港從「新興工業國家」轉移到「崩潰中工業國家」完全是起因於它成爲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陷阱。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香港容許其前途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糾結一起，尤其是與「統一祖國」的目標相瓜葛，並且參與這些目標討論的人士很快地發現它意味着香港本身毫無前途可言。甚至是中共，正如我們會看到的，可能希望在談判香港問題時避免從「統一祖國」的角度來談，但是一旦這種觀念本身進入討論之中，即無法避免此一陷阱。中國係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品這種概念仍然如此根深蒂固，而每逢這種概念成爲當時政治問題時，其結果將全然註定不會顧及這種演變是否損及各方面的利益。就香港而論，讓過去主宰未來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錯誤包涵着一項對臺灣更爲嚴重的警告。

香港自始即須瞭解它不是一個真正的英國殖民地。它是一個華人城邦（city-state），在一幅便利的旗幟下可以便宜行事及獲取利潤，好像一艘美國或日本、或香港船隻都在賴比瑞亞或巴拿馬註冊。而英國本身已長久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一九八三年六月廿二日，在英女皇的國會開幕詞（係由余契爾政府爲其撰稿）中，她清楚地分辨英國對福克蘭羣島具有「義務」，對直布羅

註① Japa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Japan 1983: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okyo: Kezai Koho Center, 1983), pp. 1, 9.

陀具有「承諾」，對香港具有「計劃」。工黨久已希望擺脫香港，因其視香港為英國工業的經濟勁敵；並且余契爾政府在談判香港問題以達成一項特定結果時，未曾面對來自任何方面的國內政治或輿論的壓力。

香港不應視作英國殖民地的理由就是該地完全沒有英國移民。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八是華人。事實上，從一九五一年的聯合國王國籍法規到一九八三年元月一日生效的新國籍法，即足以表明英國對香港的真正興趣。這些國籍法規否定在香港出生者及在香港獲准居留許可的中國移民可以擁有英國公民權與移居英國的權利。英國最希望避免出現不列顛羣島成為香港華人殖民地的情況。甚至中共亦認定香港不是殖民地。一九七二年三月，中共加入聯合國後，其最初的行動之一就是要求聯合國殖民地特別委員會將香港和澳門自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除名，因為在名單內的殖民地將可尋求獨立。

在世上有一些城市和領地，其法律地位和其實際功能相比而言，是不相關聯的，香港即為其中之一。這些地方經常處於大國邊緣或某些國家之間的夾縫裏，它們成為鄰近大國達成重要任務或緩和重大壓力的工具。這些大國發覺其存在對他們有利，但是因本身的法律僵性或意識型態的負持而無法面對此種事實。這種例子包括往昔的的港（Trieste）和但澤（Danzig，今名格但斯克）、一九七五年以前的貝魯特，現今的邁阿密（Miami）、摩納哥與拉斯維加（Las Vegas）、百慕達和卡門羣島（the Cayman Islands）；當然還包括十六世紀以來仍舊存在於東亞一隅的澳門「政權」②。

香港並非英國人所建立的，如同臺灣或南韓不是日本人所建造。香港和臺灣都是中國大陸的流亡者與移民所建造。香港作為英國貿易站已有一百四十年歷史，但是其具有歷史意義的時期則始於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及一九五一年聯合國因中共參加韓戰而對之實施貿易禁運之後。香港自此開始發揮三大功能：(1)作為逃避共禍的中國大陸難民的避難所；(2)成為中共賺取外匯的主要來源，在其他地區中共出口貨物（例如中國食品、藥草和水）都無法如此大量的銷售；(3)作為金融中心與製造業中心，為太平洋盆地和世界其他地區提供服務。在一九八二年香港這三大功能的重要性仍然與過去三十年相同。雖然毛澤東死後，中共轉入改革時期；但是在在一九七七年與一九八〇年之間，仍有四十多萬中國大陸的移民在香港定居和就業，這是被人所遺忘的事實。香港執行這三大功能的能力若告終止，不僅是香港人民，而且太平洋盆地所有的國家都會受到重大影響。

當我說到香港係中國歷史所造成的陷阱時，我的意思是什麼？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廿五日，中共港澳人大代表在北平一次會談中（在余契爾歷史性訪問之後），問鄧小平為什麼不能維持香港現狀，鄧某說「假如我同意延長租約，我就成為李鴻章第二」③

註② 關於澳門和香港兩地主權歷史的明顯處理，請參閱 Austin Coates, *A Macao Narrative* (Hong Kong: Heinemann 1978), pp. 84-107. 鄧小平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答覆「百姓」（香港），第五十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 (trans. FBIS, July 21, 1983, pp. W1-W4)。耿心成為「李鴻章第二」一語多處出現在中共對香港的評論。參閱「百姓」，第卅二期，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 (FBIS, Sept. 24, 1982, pp. W3-W9)。李鴻章（一八二三

年—一九〇一年）是滿清末年一位傑出改革者、外交家與政治家。他在租借新界給英國的行為反映著在所謂租界時期中國十九世紀外海的過程。參閱 *Immanuel C. Y. Hs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Thi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48-55.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場合中對一羣日本新聞從業人員訪問團說明「有關香港的所謂三個條約，我們認為是不平等的，但是有了條約，這是事實，而且條約上是明文寫了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到期。因此我們不擬把這個日子提前，也不要推後。我們要在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對中國來說，這是我們尊重歷史的一個態度」^④。

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尊重歷史」具有高度的選擇性。胡某和其他中共領導所看待的歷史是和三個條約——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和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始的九十九年租約——的歷史相關，這三個條約之中任何一個都是十九世紀清朝與西方帝國主義對抗的分水嶺。自一九五〇年以來香港如何發展的歷史、以及中共經濟發展時粗率試驗所得悲慘紀錄的史實，並未引起現在中共領導的關心，但是這兩項史實均引發大量難民進入香港。同樣地，可以注意到中共領導在對待臺灣問題時所提出的主張也傾向於有選擇性的史實——強調臺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繫，而忽視日本結束佔領以後臺灣的可觀成就。

中國人或外國人會把鄧小平當作李鴻章第二，這是難以想像的，不過為什麼鄧某會提出這種比喻？我們無法知道，但是至少有三種可能的解釋，其中任何一種都具有決定性。(1) 契黎爾首相對鄧小平提出條約問題，而中共政治領導不會讓此事輕輕略過。(2) 即使鄧某和其他經濟改革者有強烈的動機不去擾亂香港的現狀，但在內部政治衝突時都須承擔「放鬆民族主義」的罪名。(3) 中國民族主義成爲中共利用的良心策略以圖瓦解「民意牌」（這是共黨報紙的術語，指稱香港羣衆情緒可能被動員來反對英國將主權交給中共），並且圖謀軟化臺灣，因爲臺灣是中共繼香港之後的最終目標。這些因素都需要作進一步的討論。

鄧某在談論香港前途時有可能比較願意避免提到條約問題。他本身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二年之間的大部份時期中是中共政權內的一名高級決策官員，充分了解中共爲自己的利益及十足的理由而不斷地保持港、澳兩地的特殊地位。一九七四年在葡萄牙革命之際，北平拒絕葡國所提歸還澳門的建議，並且在翌年與葡方簽訂一項條約，確認澳門是葡萄牙治理下的中國領土。

中共容忍其南部邊界領土分離的原因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〇年之間的三十一年，中共對外貿易祇有十二年逆差。但是如果把對香港的貿易不予列計，中共外貿就有廿四年的逆差。正如饒氏（Y. C. Jao）所言「坦白說，中共利用其對港貿易的盈餘以彌補對其他國家貿易的逆差」^⑤。表一簡列中共在香港市場的經濟得利。

對中共經濟現代化而言，今日香港的價值大於過去三十年任一時期。饒教授認爲香港財源的喪失，就中共經濟整體規模而言，不會對其現代化造成重大傷害，不過肯定地「代表着嚴重的挫折」^⑥。既然這樣，目前中共經濟現代化建設的領導人鄧小平爲

註④ 香港〔文匯報〕，在〔遠東經濟評論〕（英文），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五日，頁十四討論過。

註⑤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日，頁卅九。

註⑥ Y. C. Jao, "Hong Kong's Role in Financ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A. J. Youngson, e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Economic Nexu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0.

何耽心被稱作李鴻章第二？而且在過去並無無人對毛澤東或周恩來提出這種指控。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初，大部份香港人認為對此問題的答覆是如此的明顯，尤其是在大陸目前的「改革」時期，以致使他們相信香港的前途是安全的。這種觀點即係香港人士所稱的「蜜桃主義」。黃錦明解釋說「香港是否可以維持現狀，就要看香港人是否可以不停地製造出合乎幾位主人胃口的『桃子』，一個接着一個送到主人口中」^⑦。相當諷刺地，在一九八二年香港甚至給予英國一個蜜桃，捐贈二千萬港元給專為照顧在福克蘭羣島戰爭中陣亡的英軍家屬而設的福利基金。

爲什麼這種經濟利益理論未能獲得支持？有數項理由互相關連，但可分別加以探討。第一，中共經濟發展的努力可能不像外界所推測的佔有最優先地位。放寬經濟管制的實際目的，與其說是認真促進穩定的經濟成長，不如說是想藉此來刷新共黨的正統性。即使是對鄧小平改革抱高度樂觀態度的美國學者查果里亞 (Donald Zagoria) 亦承認：「(在中共) 仍然沒有把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一貫策略，而且經營一套混合制度的問題限制多多」^⑧。

與此有密切關係的是，北平領導者似乎嚴重地誤解香港經濟及其社會政治結構。有充分證據顯示出北平方面的這種短視。例如，北平大部份高級領導(不同於研究機構的低階層專家)顯然係閱讀香港共黨報紙以獲得他們對香港的大半情報。不用說，「大公報」和「文匯報」對蜜桃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例如，香港「大公報」發行人暨中共人代常委會委員費彝民最近寫道：「過去不是也有人說中國人治理不好上海嗎？事實證明中國人完全可以治理好。既然有能力治理好上海，也就有能力治理好香港」^⑨。

費某是香港老居民，知道這種話是無意義的。一直至毛死時，上海曾是紅衛兵的屠宰場，亦是一座鬼域，並且是世上治理得最差的地方。事實上，香港是上海尚未被共黨統治時的活見證。當然，費某所言香港華人能十分有效地治理香港是正確的，但是他應

表一 中共取自香港的外匯淨收入(百萬美元)

項目/年代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貿易順差	1741.4	2259.5	3034.1	4407.2
滙款	394.9	477.3	562.9	673.7
旅遊	223.5	367.5	819.4	951.8
投資利潤	367.8	461.0	609.9	824.9
總數	2727.6	3565.3	5026.3	6857.6
佔中共外匯收入的百分比	29.3	31.7	31.8	36.5

資料來源：Y. C. Tao, "Hong Kong's Role in Financ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A. J. Youngson, e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Economic Nexu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註⑦ 黃錦明，「香港處於歷史轉捩點」，〔百姓〕，第卅一期，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 (FBIS, Sept. 24, 1982, P. W8)。
 註⑧ Donald S. Zagoria,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62, No. 4 (Spring 1984), p. 895.
 註⑨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3, 1982, p. 13. Also see *ibid.*, March 8, 1984, p. 24.

當引用新加坡和臺北作比方，而非上海。問題是：他在北平的讀者知道嗎？

中共誤解的另一證據可以在它再三提及大陸「援助」香港繁榮一事中發現之。下述摘自（北平）「新華社」的電訊即為典例：「去（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京廣鐵路英德段因水災而使運輸中斷，爲了保證對港澳的鮮活商品的供應，湖南、江西組織了大批汽車連日趕運活豬，山東遼寧積極組織海運活牛，廣東、廣西、福建也利用海運增加鮮活商品的供應。因此，京廣鐵路雖中斷了十多天，但內地仍保證了香港市場的需要。如果不是中國內地長期以穩定的價格，源源不絕地供應香港民生用品，香港的通貨膨脹將會大大加劇，所謂低廉的勞動力市場就會缺乏存在的物質基礎」^⑩。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曹維廉的論調也是一樣，他在最近詳細說明「中國的犧牲以協助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而他的主要例證是中國大陸在港投資（中共藉此獲利）與「供應香港衛生紙」^⑪。

對於在接收香港之後是否允許賽馬和麻將存在的宣傳戰，大概是中共對香港評論不切實際的最佳典例。最初，據說賽馬是「不健康的殖民地活動，將予以禁止」；而後廖承志表示祇要把在快樂谷的皇家香港賽馬俱樂部皇家頭銜去掉即可許其存在^⑫。北平的這些宣佈顯然是想使香港人民安心，但實際上，這些溫順而籠統的宣佈似乎比沉默更招致香港居民的焦慮。吳愛理（譯音，Margaret Ng）或許是這種情景最敏銳的評論家，她希望中共停止再說「請放心」一語，因為這句話比他們所說的其它話語更易使她焦慮不安^⑬。

鄧小平及其同僚不瞭解香港經濟、高估自己治理香港的能力，並且因爪牙們的傳達而致誤解港情，都是可能的實情。不過這些都不是使中共放棄卅年來不干預香港的充分理由，當香港的繁榮可使其得利之際。所以我們就須從經濟問題的考慮轉到何以會耽心成爲李鴻章第二這個問題。對此問題有一種頗合事實的猜測，那就是在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對香港並無固定政策，但却因余契爾首相的錯誤不當談話而導致鄧的反應。

一九八二年五月，當時英國外相卡靈頓的副手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在籌備余契爾九月訪問之際，注意到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是由英方提議的。阿特金斯表示「中共表示他們注意到這問題。他們令我了解他們將研究應採取的路線……他們對香港尚未有決定性立場。他們除了承允對香港的特性、它的自由港口及其企業、商業、貿易的中心地位加以考慮外，未作其他任何

註⑩ 「中國內地對香港繁榮決定性的全力支援」，〈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FBIS, Sept. 26, 1983, p. E2）。

註⑪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8, 1983, p. 12. Also see *ibid.*, March 8, 1984, p. 24.

註⑫ 「百姓」，第卅二期，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FBIS, Sept. 24, 1982, p. W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9, 1982, pp. 1, 30. 「廖承志論港人治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二日，頁11。

註⑬ Margaret Ng (Wu Ai-li), "The Second Stage of Anglo-Chinese Talks," *Ming Pao*, July 14, 1983, p. 17.

保證」¹⁴。英國政府在香港華人組織的強烈支持下，準此觀點於一九八二年進行香港前途談判，因為這個時間似乎特別適當。此際倫敦政府由保守黨 (Tory) 執政，余契爾剛贏得福克蘭戰爭的勝利，鄧小平似乎處在權力巔峯，並且中共已發動經濟改革運動與開放民主。在這些條件下談判租約期滿後英國政府對香港的永久統治，似乎十分完美。

但是錯誤的發生係因運氣壞、高峯會議準備不夠以及極端的無能。余契爾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訪問北平時，僵硬地堅持十九世紀所訂條約的合法性，她甚至極力辨明中英關係史是一部「貫穿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期一再加強的文化與科學接觸」的歷史。可以想像到她不會聽過額爾金 (Lord Elgin)、哥登將軍 ("Chinese" Gordon) 和哈特爵士 (Sir Robert Hart) 在中國大陸的活動事實。社會民主黨黨魁任金斯 (Roy Jenkins) 似乎道出了一個單純的真理：他說余契爾挑起一場「無意義的、不成熟的及潛在有害的爭論」¹⁵。

根據此一理由推論，鐵娘子試圖「罩住」鄧小平，結果是絆倒了自己。鄧某除了對抗她的觀點外別無選擇機會。「新華社」在她離開北平之後立即展開反擊：「我們必須指出，涉及香港地區的這些條約，都是十九世紀英帝國主義推行『砲艦政策』侵略中國的產物，都是強加在中國頭上的不平等條約，也是英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領土的鐵證。中國人民一貫認為這些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如果今天有人還要堅持這些不平等條約，祇能引起中國人民、英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對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回憶」¹⁶。

「新華社」的評論當然是中國人對十九世紀史實的標準觀點，共產黨的看法自不例外。出生在廿世紀的每個中國學童都讀過這段史實，並且臺灣當局也不例外，因為這也是他們的看法。確實，在余契爾訪問之後不久，「遠東經濟評論」引述在臺灣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煦的談話說「每一個中國人將樂見在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束」¹⁷。所以，余契爾無心地注定了香港談判處於最惡劣的可能基礎上。她使香港成爲中國民族主義的試金石。對於這件事的轉變，鄧小平是喜？是怒？將是我們討論的要點。但是明顯地他不會放過這樣的羞辱。

香港如何成爲「祖國統一」的陷阱，在第二類的解釋中有各種的爭論。這種觀點強調在一九八二年間鄧小平及其北平同僚已被其他要務所羈絆。他們主要是關心黨的革新，以年輕幹部替換老幹部，並且除掉毛派組織的遺跡。對鄧而言，是年最大的事件，是九月一日至十一日中共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不會如他所希望的在黨內鬭爭中做得完善。同等重要的是，鄧小平

註¹⁴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1, 1982, p. 24.

註¹⁵ 關於余契爾和傑金斯的聲明，see *ibid.*, Oct. 8, 1982, p. 9.

註¹⁶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嚴正立場」，〈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二年九月三十日 (FBIS, Oct. 1, 1982, p. E1)。

註¹⁷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頁七十二。

的勁敵們對於他處理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和對日本的教科書爭論問題，有過數月之久的抨擊。余契爾訪問的時機（九月廿二日至廿五日），就外國新聞業者的意見而言，幾乎是不適當的。鄧小平在這個時候不需要有另一個「民族威望」問題（以及可能受到內部政敵攻擊的機會），特別是像香港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嚴重損害北平的經濟發展計劃。

但是，余契爾抵達北平並且開始談論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即使鄧小平同意條約有效，根據第三個條約的條件，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仍將失去百分之八十九的土地。條約有效性這個問題以往不曾提過，但是一旦余契爾提出了，鄧就必須在他的政敵藉此攻擊他之前，立即抓住這個問題。根據這種看法，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祖國統一」，而在於北平的派系政治。在派系鬥爭中主張愛國主義的純潔性對鄧小平和他的政敵都是一項重要的武器。一旦鄧小平和余契爾開始談論條約的合法性，有關香港前途及其對中共的益處等所有理性，全都拋出窗外。

無論如何，仍有第三種可能性。從余契爾訪問北平時起，中共發動一項全面鼓吹、協調良好的統一戰線運動，目的在達成數項任務：亦即按其條件取得香港，導致英國的合作、阻止香港問題國際化，並且保持港人的溫順與分裂。這是暗指北平對香港的戰略是一規模更大的、高度優先的外交政策的一部份，旨在使共黨政權與中國民族主義相結合並置臺灣終於其統治之下。一些外國觀察家相信：經濟現代化是大陸政權的最優先目的，而且此項目的會使中共緩和其「統一祖國」運動^⑥。來自香港的證據却精確地顯示出一種反面的看法：中共政權準備付出經濟挫折的代價，祇要能夠在朝向主目標前進時值得犧牲。因此香港不是次要的問題，而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部份。在香港發生什麼？及如何發生？都將在未來數年中為臺灣前途提供各種線索。

研究中共問題的外國觀察家儘管作了三十年的分析，似乎仍不太了解統一戰線運動或者在它發生時承認這是統一戰線運動。當然，這是一種短視。統一戰線的目標之一是：將中共政權真正的外交目標隱藏在一自然發生與羣衆支持的面貌之後。統一戰線運動的一些要素是：

1. 在目標區設立與利用前衛組織和個人。
2. 創造一套曖昧不清但都似合理易言的口號，並且利用之以避免認出這是中共的真實政策。
3. 動員中共的宣傳機構攻擊並暗中損毀當時的談判對手的立場，並且孤立之。
4. 利用事先同意的規則（例如秘密談判、不公開）以使談判對手處於防衛態度。
5. 「敲邊鑼」——亦即公開作「非談判性的要求」，發佈單方面聲明，操縱外國新聞，控制議程，使中共最高級及最具新聞價值的人物涉入其中，即令他們並未參與談判，並且設定限期。

註⑥ 例如，查果里亞：「一個承諾改革的中國也將繼續是一個對外在和平與安定具強烈興趣的中國——因為改革中的中國需要和平與安定的國際環境。這樣的中國多半也較少會無理地仇視外國，因此對於一些目前最敏感的民族問題，比如臺灣與香港的前途比較務實。」『China's Quiet Revolution』, p. 903.

6. 利用場外交易與胡蘿蔔和棒子計劃——例如，提供擴大與中共的貿易作為合作的回報，利用外交官在成功談判中所具有職業利益的敏感，對第三者給予承諾使之不支持其盟友，經由邀訪，協助外國政治領袖再度競選連任。

這些要素的每一個都發生在針對香港的統一戰線運動裏。中共利用「人民對人民」的外交並且向外界洩漏有關談判席上的內情，這些內情均列在本文附錄。儘管中（共）英談判形式上保密，中共堅硬的底牌早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已是衆所週知^⑩。其底牌是：(1) 收回香港主權與治權（亦即澳門模式不可接受），(2) 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按照中共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3) 「港人治港」，但未說明如何實際作業的細節，(4) 許諾香港社會經濟制度「長期」無基本的改變，大概期長五十年。即使香港專家自始就知道此立場，中共政權仍十分謹慎地、緩慢地、一個接一個地提出這些底牌，並且使其在表面上成為對付英國極端立場的合理反應。

就英國方面而言，一開始即相信他們能夠經由談判得到租約的延長，從而使香港現狀持續至下個世紀。他們自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一直保持這種立場。相反地，中共却抨擊他們是帝國主義者與殖民主義者，並且譴責余契爾夫人是「臭婆娘」^⑪。在一九八三年七月所謂第二階段談判開始時，英國放棄維持現狀的努力，轉而謀求達成澳門模式——亦即中國主權，英國治權。英國採取這種路線導致中共統一戰線運動的高潮。北平和香港當地左派報紙不停地述說英國的建議是民族的羞辱達三個月之久；當地左派人物宣稱這種建議是瘋狂的；並且人潮般的訪客（包括被余契爾擊敗的英國前首相希斯）均被告知英方的建議是如何的不合理。這種局面的最高峯是一九八三年九月廿二日和廿三日的「黑色星期五」與「黑色星期六」，當時港元幣值跌落至空前的最低點，九·五五港元兌換一美元。北平譴責英國玩弄「經濟牌」，並且強硬地拒絕香港資金外逃可能反映港人信心喪失的這種想法。但是，後來發現在這段恐慌期間，却是中共在港機構「中國銀行」美元的最大的買主之一，它企圖保護它的外匯收入^⑫。在此時期的中期，中共宣佈如果在一九八四年九月未能達成協議，它將單方面宣佈對香港的政策方針。

到十一月英國終於認輸。中共的宣傳戰立即停止，並且在北平的談判中恢復了誠懇的態度。談判繼續著，但是英國僅僅試著釘牢「港人治港」的少許細節，不然就是找出一些微枝末節以掩飾他們的撤退。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英國外相賀威（Geoffrey Howe）在香港宣佈人人已知六個月之久的事實：「雖然中英政府協議的內容仍然有待商榷，但我認為我應該在這時候告訴大

註⑩ 參閱陸輝，「港人治港」，「百姓」，第卅四期，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頁二一一—二一五（FBIIS, Oct. 28, 1982, pp. W1-W4）。該文包涵「中共基本立場，在一九八三年底為英國所同意。」

註⑪ 「爭鳴」（香港），第六十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頁十六—十七（FBIIS, Nov. 5, 1982, p. W1）。

註⑫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頁四（FBIIS, Sept. 27, 1983, pp. E1-E3）；*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 6, 1983, p. 20--；北平「新華社」電，一九八三年九月廿二日（FBIIS, Sept. 23, 1983, pp. E2-E5）。

家，要達成一份能使本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由英國繼續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②。對一些觀察家而言，這番話跟一九七三年華盛頓與河內關於南越命運的談判，似乎很為相似。

香港談判有許多有趣的情況祇能在此簡略提述。有件事實就是英國顯然不會威嚇要使談判破裂，即使是他們的立場一開始即告無望；這樣的熱切討好，自然使得對方佔了上風。另一事實是在整個談判期間，香港兩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日本和美國——保持陰森森的沉默。有些證據顯示中共私下保證他們可從英國的撤退獲利^③。第三件怪事是前中共江蘇省革委會主任、新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大搖大擺地訪問位於新界的九龍城。按照一八九八年租約，九龍城是有主權爭議的地區。如果許某意在表示這是中國治理的例子，他的行為比起費彝民的論述上海更加令中共的目標受到困擾^④。

無論如何，談判過程中有一要務必須詳細處理，因其關係到香港人民的利益；且長遠而言，關係到海外其他華人團體，例如臺灣的利益。在香港，這個問題即為衆所週知的「三腳橈」問題。一九八二年九月，余契爾夫人陷入中共圈套而同意初步談判處理條約問題，但是她也做了另外件事使他們大為焦慮。她公開表示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中（共）英協議必須是三方面都可接受的：中共政府、英國國會和香港人民。她和以後的英國發言人都使用「三腳橈」作譬喻，如果其中一脚不堅固，橈子即會傾倒。這個關於香港人民同意的問題，或者更精確說，港人在被諮詢（亦即全民表決）時，會拒絕任何中共接受的協議的可能情況，是英國曾經擁有的唯一真正談判籌碼。英方不會利用它，大半因為中共致力於抨擊三腳橈及分化香港民意。

一個難題立刻出現並且仍然存在。雖然余契爾應允諮詢港人，但是實際上香港沒有一個官方機構存在，可使她的承諾易於進行。在一九六二年魯亞（Evan Luard）撰述香港史時寫道：

雖然華人非官守議員及時被任命為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但在實際上，這些中國議員對於治理方式的有效控制，並不比他們的歐洲對手更具能力或熱忱。今日香港的體制，在各主要方面仍然完全保留一八四三年殖民地建樹時所引進的樣子。因此，兩局仍如往昔一樣，為官守或派任議員所控制^⑤。

在這番敘述後的廿年，情勢祇有輕微的改變，增設了區議會和在兩局多增一些非官守議員。然而，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四日，一顆炸彈終於在香港政治界爆開了。立法局一名資深非官守議員羅保（Robert Lobo）要求在最後協議簽訂前須由立法局公開

^②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1, 1984; *London Economist*, April 21, 1984. Also see the *Economist*, April 7, 1984, pp. 17-18.

^③ *London Economist*, November 12, 1983, p. 92.

^④ 關於九龍城的背景，參閱 Evan Luard, *Britain and Chin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180, 183. 關於許家屯的訪問，參閱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 18, 1983, p. 1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27, 1983.

^⑤ Luard, *op. cit.*, p. 179.

辯論中（共）英談判。中共對此迅即反應。北平並不希望任何形式的民主注入談判。中共廣東省政協主席梁威靈宣稱「他們能夠辯論任何事務，過去或現在，本地或國外，自南至北地辯論……但是香港問題是英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事」^②。

「三腳橈」發生最激烈的爭鬧是在一九八三年夏，正值每月談判第二回合開始之際。英國在其談判陣容中增加一員，即現任港督尤德（前英駐北平大使）。在七月七日的記者會上，尤德答覆關於他在談判中代表誰的問題時表示：「我是香港總督，……確實代表香港人民。此外，我還會代表誰。」中共外交部次日對這問題的答覆是：「尤德是作為英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談判的。因此他在會談中祇代表英國政府」^③。中共也採取行動，拒發簽證給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曹廣榮（Peter Tsao）。曹本是準備和尤德同往北平。曹廣榮在五月間對英國一家報紙說，如果香港前途置於中共主權下，他自己將會移民外徙，這番話業已激怒中共。英國對於這些發展並未提出抗議：尤德作為英國政府官員參加談判隊伍，曹某留在香港，並且至今無香港人民的代表出席談判。

中共堅持它是香港人民的代表的觀念，瞭解此種觀念的港人就是「愛國者」。無論如何，這種主張把我們帶到在整個香港爭執中最重要的問題上面。我們有證據證明港人的實際想法是什麼。在一九八二年五月與一九八三年四月之間至少有過五次不同的科學性民意調查。最早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港人願意選擇「維持現狀」的解決方式。一九八三年四月最後的調查發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並未改變這個選擇。祇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港人認為香港成為中共的「特別行政區」是可接受的，並且當問題是「香港歸還中共」時，祇有百分之廿六的港人支持。根據調查顯示，（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不少於百分之廿二被調查的人士——大部份是十五歲至卅四歲——將盡力設法離開，如果香港交還中共。調查機構說明另一個數字顯示將有七十一萬人謀求離開香港^④。

在這種情境下，中共不希望有民意調查、立法局辯論、官方或非官方的公民投票、或任何形式的所謂的「民意牌」，是不足為奇的。無論如何，更重要的是中共已十分成功地對付及混淆民意。中共統一戰線策略的精華就是把自己與「中國」視為一體，避免提到共產黨，並且把他們的中國勁敵烙上背叛「統一祖國」這一崇高目標的叛國者的印記。吳愛理對這種策略如何在香港運作提出了最敏銳的分析：

公然批評「中國」在任何方面比西方落後，無論這種批評如何合理，總要準備遭到一場暴風雨般、痛苦、激昂及粗魯的抗議

註②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8, 1984, p. 26.

註③ *Ibid.*, July 21, 1983, p. 12; Xinhua, July 8, 1983 (FBIS, July 11, 1983, p. E1).

註④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0, 1982, pp. 14-15; [七十年代月刊] (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一一——一二；*ibid.*, July 1983, pp. 39-42; and D. K. Lewis, "The Prospects for Hong Kong", *Conflict Studies* (London), No. 142 (1982), pp. 17-19.

。把某些事物與「中國」或「中國人」結合即具有把任何問題迅速轉變為高度動感事物的力量。談到文化認同就像遇上一個濃厚的煙幕，使每個人在黑暗中陷於無理無知的爭論。「香港自治是可行的嗎？」是一個能夠十分合理討論的問題。若提到「爲什麼中國人不能和英國人一樣，或比英國人更好地統治香港，其理安在？」這種問題注定了你的討論是場毀滅。問及「你喜歡中共在一九九七年統治香港嗎？」，那麼你可能會有一個合理的討論。問及「中國應該擁有香港主權嗎？」即使那些瞭解這是前一問題的影印版的人士都會保持沉默。引發中國認同感的力量再三出現，甚至在過去一年之內，甚至遠離一九九七年的問題。……凡是不承認這種認同感是件偉大的政治武器的人士都應當檢查一下他的腦袋^②。

中共巧妙地利用這「偉大的政治武器」已有效地阻止港人之間達成任何形式的團結，藉以影響他們自己的命運。在香港或留、或去、或轉移資產於海外、或準備逃亡路線，一個家庭接著一個私自做了決定，但這些並非政治抗議的任何部份。甚至是共黨也發現這種現象，亦即香港的百萬富翁訪問中共時公開贊揚收回香港，但是當他們回家後都儘快地私下把資金套出香港^③。祇要中共能夠保持港人的分裂和無動員狀態，就不會對其接收計劃有任何真正的障礙。而外國強權，特別是英美等民主國家，都把這種缺乏公共抗議的情形，解釋爲對中共主張的正統性的承認，特別是在中共這樣做能爲它們的利益服務的時候。

那麼，香港人民究竟在爲未來做些什麼呢？大體而言，他們正在探尋「一九九七年事業」能夠提供些什麼？這包括北美方面贊助的不動產討論會（通常是關於移民問題的會議）；努力使家庭至少有一人可按某些資格移民海外；同意國際通婚，根據倫敦「經濟學人」報導，這是一項「興盛的行業」；並且將資金轉移外地。根據可靠估計，僅僅在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期間，外滙淨負債即達到七十六億港元^④。每一次新的震撼祇是爲「一九九七年事業」提供更多的生意，最近的一次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廿八日怡和公司決定將其總部遷到百慕達。諷刺地，怡和的最大勁敵——船王包玉剛早已將他的事業遷往百慕達，包括他和中共的聯合投資企業。

此際，數百名中共幹部正抵達香港，由他們新的西式穿著即易認明，而且許多駐在人員準備接收。香港崩潰的房地產市場有一有趣的側照，即對價格高昂的大廈頂樓或視野遼闊的公寓的需求減少，而對高度不超五樓的房子的需求反見增加。其原因，正如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釋的，是一九九七年：「你看過中共的電梯正常工作嗎？到一九九七年我們必須能夠步行上樓。」

註^② Margaret Ng, "Cultural Prid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5, 1983.

註^③ [百姓]，第卅三期，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頁五 (FBIS, Oct. 6, 1982, p. W2); *ibid.*, No. 52, July 16, 1983, pp. 3-4 (FBIS, July 21, 1983, p. W3) (鄧小平評論「大資本主義者」)。

註^④ *London Economist*, November 12, 1983, pp. 91-93. 關於一個大的房地產市場的報導，參閱 "The Money Keeps On Coming from Hong Ko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16, 1984.

讓我總結本論文提出的兩項要點。第一，民族主義——不是經濟改革，也不是對民主的開放或解放——才是中共今日的主要政治原則。事實上，鄧小平企圖在此基礎上重建黨的正統。縱使主要外國強權，特別是民主國家，正協助鄧在這方面的努力。中國的民族主義，當其延伸至中共邊界以外時，將可證實對中共、以及對其鄰邦都是一個危險的勢力。中共的最近歷史正好和蘇聯的發展相對比，蘇聯共黨也成爲更民族主義化，並且保存其地位勝於意識型態。

第二，中共總理趙紫陽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在渥太華的演說中表示「我們對香港所要採取的一切政策同樣適用於臺灣，並且猶有過之。統一是我們最迫切的任務，我們希望早日達成和平統一。」因此，臺灣已有了充分的警告。危險的是統一戰線運動甚至比在香港的運用更爲廣泛。臺灣必須準備加以對抗，包括中共陰險地操縱中國文化的民族主義，這種文化的認同實際上是中共爲海外華人所設的陷阱。臺灣作爲中共未來統一戰線運動的目標，必須準備廢除中共用以對付臺灣的「正統」和文化武器。尤其重要的，羣衆動員和自決是不可避免的。香港人民在涉及他們命運的政治方面的失敗已注定了自己的命運。這些却是來自香港的教訓，除了無法預見的發展之外，香港是完了。但是，香港的例子能夠提供一張十三年的保險單，在這段期間其他的海外華人社會能夠安頓好他們自己內部的事務。

附 錄

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平—香港之間「人民對人民」會談及有關中（共）英秘密談判的聲明之部份清單

（O代表官方會談，U代表非官方會談）

內 容

順序 型式 時 間

1. O 八二年九月廿二日—廿五日
2. O 八二年九月廿六日—廿八日
3. U 八二年十月廿九日
4. U 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5. U 八二年十一月廿日
6. U 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7. U 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余契爾首相訪問北平，啓開香港前途談判。

余契爾訪香港，係第一位在職首相到訪。

地產界大亨拜訪「新華社」香港分社，確定香港現狀祇剩十五年。

香港貿易發展局代表團在北平獲告知「在未來一、二年內」將擬定一項計劃。

廖承志對來訪的工廠業主解釋港人治港的構想。

廖承志告訴來訪的工業界人士代表團，表示中共久已考慮港人治港。

趙紫陽和谷牧與香港卓越的實業界領袖人物胡應湘和鄭應彤討論經濟合作。廖承志

會見香港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中共政治局委員暨前廣東省長習仲勛向貿易發展局代表團再度提出保證。

8. U 八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9. U 八三年元月七日
10. U 八三年元月十日
11. U 八三年元月十八日
12. U 八三年二月十一日
13. U 八三年三月十三日
14. U 八三年四月五日
15. U 八三年四月九日
16. U 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17. U 八三年五月一日
18. U 八三年五月十二日
19. U 八三年五月十六日
20. U 八三年五月廿九日
21. U 八三年六月六日
22. U 八三年六月十七日
23. U 八三年六月廿日
24. U 八三年六月廿二日

陷阱重重的香港——一場沒有贏家的遊戲

鄭裕彤和胡應湘返港，表示趙紫陽注意到香港人民的焦慮。中共駐美大使館參事冀朝鑄表示未來香港總督必須是中國人。新界鄉議局部份人士動身前往北平會談。

香港「文滙報」（左派報）社長李澤中（譯音）抨擊「三腳橈」。美國國務卿舒茲訪問北平後在港表示香港前途「有希望」。中共告訴英國，香港在南海石油探勘將扮演重要角色。將近一百四十名港澳人士被選為中共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定於五月三十一日啟程前往廣州和北平。

英國工黨籍國會議員摩勒（Roland Moyle）在訪問北平後表示，在香港歸還中共後，由港人治港。

香港大學講師John Young自內地返港後表示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會有「小憲法」。香港中間偏右的雜誌「百姓」透露，廖承志告訴來訪的學者，表明一九九七年是收回之期，不提前也不延後。

廖承志接見新界三十名商業人士，拒絕「三腳橈」構想。上海經濟代表團訪問香港。前江蘇省長、中共中央委員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內定人選許家屯在廣州接見香港工業界代表人士。立法局議員李鵬飛、周梁淑怡和張鑑泉前往北平；習仲勛在五月廿二日告訴他們，中共將謹慎處理香港問題。

中共告訴來訪的香港新聞界人士，表示在收回主權後將「長期」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趙紫陽對「全國人大」表示，中共將在適當時期收回香港主權，並採取適宜措施維持其繁榮。上海市長汪道涵表示上海與香港應努力合作。

許家屯在北平宣稱中共對香港的主權是不容談判的。

美國「新聞週刊」表示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告知余契爾，在兩年內應達成協議。週刊表示這是胡耀邦對美國學者張旭成透露的。

汪道涵表示上海會協助香港。

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所有的代表追隨中共的路線。

「新華社」香港分社新任社長許家屯抵港履職。

中（共）英聯合聲明：第二階段談判於七月十二日開始。英方談判代表：駐中共大使柯利達，港督尤德、政治顧問麥若彬。中（共）方談判代表：副外交部長姚廣、「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菊生、西歐司顧問魯平。

港府新聞處處長曹廣榮遭中共拒發赴北平的簽證。

美國學者楊力宇說明與鄧小平會談情形。鄧表示香港前途在中共手中；「否認這點就是否認現實，並且製造危險的假像」。

第二階段第一回合談判。

許家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會上對左派人士表示，正在作出「公正合理的」解決辦法。

第二回合談判。形容談判是「有益的」。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團自北平返港，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草案要點。證實十月十四日黃夢花將會見姬鵬飛。

第三回合談判。使用「有益的和建設性的」措辭。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齊懷遠拒絕置評。香港左派報紙展開宣傳攻擊。

許家屯大張旗鼓地走訪九龍城。

左派摩托車業職工總會支持中共的主權要求。

胡耀邦對日本「每日新聞」表示中共將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這是首次提到確定日期。

北平任命前外交部長姬鵬飛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更多的工會支持北平。許家屯告訴參加晚宴的人士不要耽心，中共已有維持香港穩定的政策。

鄧小平對英工黨前首相希斯表示，香港前途看好，主權不容談判。希斯於九月十三日在港與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會談時突然離去，因有人稱他是鄧的「代言人」。

中共外長吳學謙表示英國必須放棄「強硬的」態度。中共法學家兼中國民主同盟主

25	U	八三年六月廿五日
26	U	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27	O	八三年七月一日
28	U	八三年七月九日
29	U	八三年七月十一日
30	O	八三年七月十二日—十三日
31	U	八三年七月十九日
32	O	八三年七月廿五—廿六日
33	U	八三年七月廿九日
34	O	八三年八月二日—三日
35	U	八三年八月七日
36	U	八三年八月十三日
37	U	八三年八月十五日
38	U	八三年八月十七日
39	U	八三年八月廿六日
40	U	八三年九月十日
41	U	八三年九月廿一日

42 O

八三年九月廿二日—廿三日

席史良譴責英國企圖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繼續統治香港。中共另一法學家宦鄉在港訪問時表示中共希望穩定惡化中的香港經濟。

43 U

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第四回合談判，未使用「有益的和建設性的」措辭。「黑色星期五和星期六」，港元跌至最低點（一美元兌九點五五港元）。

44 U

八三年十月十日

姬鵬飛肯定一九八四年九月為達成協議的「限期」，否則中共將單方面宣佈其對港方針政策。對那些公開說明港人不歡迎「祖國」統一的香港人士烙上說謊者之名。中共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何英表示香港主權是「不容討論的」。「人民日報

45 U

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呼籲英國應更「務實些」。

46 U

八三年十月十四日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表明支持中共立場，此係第一個外國領袖如此作。市政局民選議員黃夢花透露九月廿七日與姬鵬飛會談內容，姬某說明中共計劃的全貌。

47 O

八三年十月十九日—廿日

第五回合談判，表示是「有益和建設性的」。左派宣傳攻擊迅告終止。

48 U

八三年十月廿八日

季辛吉在香港表示美國必須遠離香港問題。

49 U

八三年十一月一日

香港理工學院院長自北平返港，表示姬鵬飛是樂觀的。

50 U

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齊懷遠再度肯定一九八四年九月的限期。新界區議局代表團前往北平，姬鵬飛於十一月十五日告知該團，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以「小憲法」為基礎，香港將維持五十年不變。

51 O

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第六回合談判：有益和建設性的。

52 U

八三年十一月廿一日

姬鵬飛對港澳代表重申中共的立場。

53 U

八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胡耀邦在日本向中曾根保證保障外國在港投資。

54 U

八三年十二月一日

姬鵬飛接見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代表團。

55 U

八三年十二月二日

許家屯表示中共將在九月前公佈「小憲法」內容。

56 U

八三年十二月三日

中共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表示中共憲法並不要求香港成為社會主義地區。

57 O

八三年十二月七日—八日

第七回合談判：「有益與建設性的」。

58 U

八三年十二月十日

香港「觀察社」代表團會見姬鵬飛，表明該社希望一九九七年之後英國仍與港有關。左派報紙強烈抨擊「觀察社」。